

# 民國佛教兩題

黃夏年

## 一 中國佛教會與早期抗戰運動

1936年11月15日至17日，中國佛教會第八屆全國佛教徒會員代表大會在上海赫德路四百十八號該會總辦事處內召開，來自全國各地的佛教界人士百餘名出席了會議。這次大會是在國家和民族受到外侵的危機，佛教界剛剛經歷了內部激烈較量的形勢下召開的，面對日本軍國主義者發動的戰爭，民族生存是當時中國最大的事情，中國佛教徒投入了這場偉大的愛國主義鬥爭之中。

“二次世界大戰惡立暴，勢陷一切衆生界於萬劫不復之地！佛徒爲報一切衆生恩，應起而抗戰，來消滅瘋狂的敵人，應用安大局，防大患於未然！”<sup>①</sup>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發生，太虛發表《致日本佛教徒電》云：“東京增上寺日本佛教聯合會，轉三千萬信佛民衆鑒：吾全世界從佛口生、從法化生之佛子，同體一心，固非民族、國家可分隔。然貴國當局，此次縱其無明貪瞋，出兵奪據華北，挑釁各商埠，作破壞東亞或世界和平之戎首，既殘安全在華之日僑，復大屠無抵抗之華軍華民，殺盜淫妄，罪無不犯，致全華、全世界皆以貴國爲怨府，實爲不智不仁之極！吾儕痛華軍民被戮，及華領土主權被侵占，尤哀貴國當局造此次惡因，將致日本國民於淪滅之慘！故除電求華軍蔣總司令等寬容忍讓，並保護在華各國僑民外，謹代表中華三萬萬信佛民衆，請貴會領導日本三千萬信佛民衆，運其大悲般若，速破除貴國當局之無明貪瞋，撤兵回日，服禮謝華，弭將動之魔戰，彰遍常之佛慈，惟

貴會勉之！并盼電復！”<sup>②</sup>

中國佛教界對日本佛教有一個認識過程。日本的佛教是從中國傳入的，日本的宗派佛教與中國佛教有密切的關係，從佛教的認同感上，中國佛教界一直認爲日本佛教與中國佛教是一家，兩國的佛教不分彼此。法舫法師認爲，“日本之佛教完全傳承於中國，或間接受於朝鮮，故凡中國之所有，日本盡有之，并能保持與發展。”<sup>③</sup>十九世紀，日本明治維新之後，原來受壓的日本佛教界積極調整與政府的關係，佛教得以重新發展，走上新的道路。日本佛學界也在“脫亞入歐”思潮影響下，派人到歐洲學習西方治學方法，又利用傳統的漢文佛學優勢，開拓了近現代世界佛學研究的日本路向，形成相應學派，走在各國前面，進而也影響到後來中國的佛學研究。法舫法師說，“對於研究教理方面，在各宗派中，可說有些興盛的氣象。這些情形又都是與中國整個社會轉變、文化思想，有連帶關係的。在清末民初時，民族革命論士，如章太炎；變法運動者，如康有爲、梁啟超、譚嗣同等，對於佛教都有深刻的研究和提倡。同時留學日本的學生和亡命在日本的志士們，亦都作佛學之研究，這對於新近中國佛學的發展，不能說不是一個主因。”因爲日本佛教的現代化與學術化特點，當時中國佛教界曾經一度認爲日本佛教應是中國佛教復興的追求對象，日本佛教界也認爲“要之，支那之佛教，就吾等之觀察點論，今日大有復興之氣運。我等東方佛教同胞，全是同文同種。今後宜互益提携，將深廣博大之佛教文化與教理，

發揚普及於全世界，使全人類，咸浴佛陀之慈光。是為互相努力之要點，凡我同志，好共為之。”<sup>④</sup>“同文同種”的信仰思維，一度深深地影響中國佛教界人士。太虛曾經專程去日本考察佛教，回國後認為“中國佛教的新建設，主張採取日本、緬甸、錫蘭、西藏之所長，以改良中國舊有叢林的流弊，其意誠美矣，然無以改造中國佛教之本身，則終末由兼采移植而去腐換新。夫日本所由得成其教義之研究與宣傳及社會事業的開展，乃因其向有各宗派之系統組織，與寺僧家俗化之富於人世精神。但回顧中國則各宗派有名無實，毫無系統，且今後趨勢亦更無嚴別宗派組織之可能；基以原有林寺庵院復主戒律之嚴格，益不能有家俗化之人世精神，則烏從而得采日本之所長哉！！……依此由還俗的及原來的在家佛徒成為有系統而闊大之組織，於日本佛教之長處乃能取得；嚴格養成少數之學僧、職僧、德僧，建為只有公產無私產而組織統一的僧團，錫蘭、緬、暹的僧制美風，亦可仿佛實現；因是，得國民普遍之崇仰及僧德提高之極成，而西藏勤苦修持習尚，亦堪培就。且專就僧內言之：學僧亦名比丘僧，規律嚴肅，可有錫、暹之律儀；職僧亦名菩薩僧，事業弘布，可有日本之教化；德僧亦名長老僧，主持參學林。”<sup>⑤</sup>為了復興佛教，中國佛教界接受了日本佛教界提出的“同文同種”的觀念，將日本佛教，特別是日本的佛學研究作為學習榜樣，主張“想是除了發揚中國佛學之外，同時竭力介紹世界佛學，若錫蘭文，暹羅文，西藏文，梵文，日本文，歐美文之翻譯和著作，不論它是歷史的考證，教理的研究，實行的表證，都為刊布的宣揚”<sup>⑥</sup>之國際化的路線。

在“同文同種”的思維下，“九·一八”事變以前，是中日佛教交好的時期。1926年秋，日本召開“東亞佛教大會”，目的是策進東亞佛教之宣傳，太虛率領了中國代表團參會。次年春，日本“佛教聯會”組織“訪華團”來中國“視察佛教”，訪華團一行在中國與佛教界和學術界見面，參訪各地寺院，參加座談會，與中國佛教界進行了深度的溝通，太虛主辦的《海潮音》曾一度刊發了大量日本佛教的文章。“九·一八”事變發生，中國佛教界譴責日本軍國主義政府的暴行，但對日本的佛教界還心存在幻想，太虛認為：“我臺灣、朝鮮、日本四千萬信佛民衆，應速速成

為一大聯合，以菩薩大悲大無畏之神力，曉諭日本軍閥政客因果之正法，制止其一切非法行動。如勸阻而不聽從，則進而與東亞、南亞以及全球之佛教徒聯合，組織成佛教之國際，以聯合振興亞洲各民族皆獲平等自由為職志，亦以聯合世界上平等相待各民族，實現永久和平為歸趣，起而若廢若黜日本軍閥政客之增上名位，使不能憑借以施行其上品之暴惡，逼惱中國五族以及臺灣、朝鮮、日本一切無辜之有情民衆。咄！咄！我臺灣、朝鮮、日本之四千萬從佛口生、從法化生的同胞，君等其真為信佛民衆乎！君等其真以佛菩薩之心為心乎！君等其真正奉行佛菩薩之教訓者乎！將以君等對日本軍閥政客能否制止其非法行動以決之。咄！咄！我臺灣、朝鮮、日本！四千萬佛教同胞其速起！速起！速起！”<sup>⑦</sup>祈望日本佛教界能够讓日本政府回心轉意，彌兵息戰。

日本侵略中國，日本佛教界亦趨跟日本政府，妄圖肢解中國的佛教。面對這個事實，中國佛教界對日本佛教界的態度起根本變化，他們認為“中國在世界上乃一獨立的國家，今日本非法造成所謂偽‘滿洲國’，破壞中國領土行政之完整，為國際各國所不承認，此正太平洋不太平之結症，日本佛教徒，非不明白。”<sup>⑧</sup>中國佛教界在反對日本佛教界對中國佛教的誣蔑與蹂躪的反侵略正義鬥爭中，隨着國家與社會的變化而升華，太虛的思想也隨着局勢的變化而改變。日本侵略者占領沈陽，繼而占領東三省，扶植偽滿洲國，激起全國人民，包括佛教界在內的憤怒，反對日本侵略，收復國土的呼聲強烈，太虛譴責“列強壓迫中國之最甚者，要算日本。在過去的馬關條約、二十一條、五卅慘案、濟南慘案等等，且置不論。最近又逞其舊技，變本加厲，以萬寶山之案，釀成朝鮮排華，屠殺無辜僑胞；以中村事件借口出兵東省，強占我國領土，殘殺焚掠，肆無忌憚，東北精華，一掃而空。此種暴行，為國際公法所不許，人道正義所不容，而日人竟悍然不顧，但求達到吞并滿蒙、征服中國之目的，可謂獍豸極矣！”<sup>⑨</sup>他呼吁反擊日本侵略，“日本橫以其海陸空軍之武力，用不宣而戰之行動，作如寇而襲之侵占，破壞中國政治與領土之完整，使國聯猶有公理，固應群起加以相當之懲裁，使中國獲伸民氣，尤應協同施以盡命之抗擊。……布長久抗抵之陣，張延宕交涉之網，縱

可令敵人不得逞其志而終獲最後之勝利。”<sup>⑩</sup>

1937年“七·七”事變發生後，佛教界發表聲明反對日本侵略中國，以實際行動參加保衛祖國的鬥爭。太虛指出：“雖甲午之後，中國屢經屈辱，然就整個中國民族以言，固無時不在圖強禦侮之準備中。待臨抗戰前夕，國防之準備仍未充足，而民氣已被逼至忍無可忍，遂演成整個民族之搏鬥。此四年間、寇方則殘暴之施展，奸偽之制演，征服之不能，求和之不得。我方則都邑之淪陷，民物之毀損，團集之愈堅，抗戰之愈烈。”<sup>⑪</sup>國將不復，教以何存？為國家，為民族的未來，中國佛教界要勇敢地擔負起歷史使命，“更希望全國僧尼，萬眾一心，全體動員，再接再厲參加抗戰救國工作。要知道實行總動員參加救國工作就是參加救世工作。”<sup>⑫</sup>佛教界人士將參加抗戰，看作是報恩的機會，強調“我們不但要圖報要挽救苦惱已迫切眉睫，垂在死亡綫上的我國家我民族的恩者，同時將瀕於水火之中，或間接直接與我們有恩者的他國家他民族，我們也要圖報挽救之，那末我們亦不得不自起而抗敵，抵抗我們的敵人，抵抗侵害我恩者的敵人！”<sup>⑬</sup>太虛以中國佛學會名義發表《為國難電告全國佛徒》云：

各地佛學會、中國佛教會、各省縣佛教會、各正信會、居士林、佛學機關、佛教團體、及各叢林寺庵四眾同人公鑒：茲值我國或東亞或全地球大難臨頭，我等均應本佛慈悲：一、懇切修持佛法，以祈禱侵略國止息凶暴，克保人類平和。二、於政府統一指揮之下，準備奮勇護國。三、練習後防工作，如救護傷兵，收容難民，掩埋死亡，維持秩序，灌輸民衆防空防毒等戰時常識諸項，各各隨宜盡力為要！中國佛學會理事長太虛叩。<sup>⑭</sup>

上海“八·一三”反對日本軍隊的戰鬥打響，佛教徒指出：“凡是中國人，當然愛中國，所以中國佛教徒，不論僧俗，都愛中國。”<sup>⑮</sup>中國開始進入全面抗戰階段，為了國家領土完整與民族解放，中國人民投入到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戰鬥，法舫指出：“時至今日，多難興邦，中國國民已能深知自己民族的本身之最後危險，故今日中國不僅政治上統一，一切都

要統一化，最可寶貴者，為各界同胞之精神上的統一，故今日中國政府之鞏固與權威，乃空前之所不能有，此皆全國國民心理統一之所鑄成也。”<sup>⑯</sup>四川佛教界專門建立“護國法會”，宣稱：“日本處心積慮，欲滅我國，已歷三十四年之久。今日既占東北，又侵淞滬，如果長保此局，全部工作，可謂已成一半。從此左宜右有，勢力更强。我們的國家，就難免坐亡之痛了。國人須知日本如果滅我國家，必定不肯再蹈元清覆轍，改朝換號，就算了事，必定更進一步，采滅國新法，來滅我種族，要滅我種族，必先我文化，今日東北的改教科書，上海的摧毀商務印書館，轟炸各大學，已經見端了，將來必更設種種法子，來蹂躪我國民的人格，銷滅我國民的智識，養成頑鈍無耻之風，使我子子孫孫供他牛馬，這是何等可怕的事情啊。”<sup>⑰</sup>中國佛教界也在民族危亡之際，發揚愛國主義的傳統，積極參與這一偉大事業之中，佛教界強調：“中國的抗戰，是為着保衛四萬萬七千萬的人民，是為着整個民族的生存，是為着世界和平，不得已了才和日本一拼死活！”<sup>⑱</sup>

中國佛教會在這一危機時刻發出了獅子吼，發表《中國佛教會致日本佛教會重要宣言》云：

中國佛教會，代表中國佛教徒，以大菩提心，供養日本全國佛教徒。合掌恭敬而言曰：自西方文化，輸入東方，一般民族，受優勝劣敗生存競爭之學說，熏陶習染，物質文明之心即啓，而積極製造武器，至歐戰事起，西方所得之結果，則適為其學說之反證。西方學者，遂在其學說上，發生極大的懷疑，亟擬在槍炮維持尊嚴之下，而接受東方文化，以維持人類之和平，是知救全世界之責任，為東方文化，以佛教，亦即東方民族，以佛教徒之責任為最之學說為最。東方民族，以佛教徒之責任為最。今中日之不幸事件，一再發生，不獨關係東亞之和平，實則關係世界之和平，我等在此時機，亟應宣傳佛陀慈悲教義，挽救世界之危險，保障人類之安寧。而貴國在民族中，受佛陀慈悲教義最深，目前此種不祥狀態發生，諸大善知識，抱大悲願力，應如何設法，使中日兩國親睦，而求人類互存愛之精神，使西方民

族,知我東方文化果足為長治久安之保障,則關係於世界文化之趨勢,及人類之幸福者其重大為如何。東方民族之責任在此,我佛教徒之責任亦在此,應各本同體大悲之心,敦促和平之實現,敬祈慈悲鑒納。<sup>①9</sup>

中國佛教會除了發表“宣言”之外,還發表了“中國佛教會致國聯各會員電”,云:

中國施公使轉國聯各會員公鑒,目前中日事件,繼續發生不祥之狀態,若再擴大,將引起世界之戰爭,非俟國聯維持和平之尊嚴發生破裂,即世界人類之慘劇立即發生,極可驚怖。中國佛教會全體佛教徒,悉本我佛大悲救世之主義,以及各宗教平等博愛之觀念,竭誠祈禱,懇切請求

貴會員等,一致轉知

貴國宗教,暨學術團體,秉慈愛之精神,負和平之責任,以人類互愛之原則,促成此事最圓滿之解決,實為我輩迫切之希望,謹此布臆,伏祈

鑒納

中國佛教會常務委員圓瑛王震暨全體會員上<sup>②0</sup>

“宣言”和“會員電”代表中國佛教界徒反對日本侵略中國的呼聲,但是口氣軟弱,以懇求的語氣來求得對方放棄,根本不足以表達中國佛教徒的憤怒。中國佛教會又發表《中國佛教會致日本佛教徒書》云:<sup>②1</sup>

親愛的兄弟姊妹們,我們同生活在釋迦牟尼如來同體大悲的教義下,在地域上我們雖有國界的分別,在精神上,我們無異於一家的人,到目前眼看到兩大民族陷入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省察到我們佛教徒應負的責任,我們不能不代表中華民國全國佛教徒向你們作這忠懇的勸告。

從九一八到今天我們兩大民族中間,擺着一串血腥的事實!這些事實,破壞了我們千餘年來的友誼,破壞了我們文化合作的關係,破壞

了東亞的和平,破壞了世界的和平。在我們的中間,造成了一座憤怒的火山,一片仇恨的大海,這是貴國少數軍人所發動的空前浩劫,而使貴國人民負擔了不可推諉的責任,敝國在物質上雖然已經受了不可勝計的損失,但是你們應記住,四萬萬七千萬的人民,四千餘年的文化,像這樣一個偉大的民族,決不是他人武力侵略所能屈服的,同時你們應當看清你們自己這幾年來所受的影響!軍備不斷地擴張,造成大眾生活之不安,社會經濟之恐慌,民族道德文化損失,尤其是,最可痛心的一批一批的純潔青年,受黷武主義的麻醉,被派遣到我們的領土上來,以瘋狂的姿態,執行所謂“光榮的使命”。我們佛教徒知道世界一切是受因果律的支配,你們現在所種如此因,我們不忍想象你們的將來應受如何的果。近日蘆溝橋事件,固然又是貴國軍人執迷不悟的盲動,但意想不到貴國人民竟會舉國若狂,一致的擁護贊助,這種盲從的舉動,逼迫敝國人民不能不放棄最後的容忍,事實發展,必然地會使人類遭逢更嚴重的危難,而貴國亦將不可避免因果律的支配在這千均一發的之時。應當講起我們佛教徒的責任——尤其是貴國佛教徒之責任,貴國佛教徒占全國人口之大多數,在社會上居很重要的地位,我們相信你們能够在時局上做一部分挽救工作。貴國佛教徒以研究佛學著名於當世,自能本所學我佛慈悲救世的精神,見諸實行。我們誠懇的希望你們抱自覺覺他的志願,放獅子吼,出大雷音,喚醒一般迷信黷武主義者,聯合大眾的力量,制止少數軍人危險的行動。我們等待你們握手,共同努力於國際仇恨及不平等事件之鏟除,以期維護東亞和平的局面,增強世界和平的力量,這不但是我們兩大民族之幸,也是全體人類之幸。

許多中國僧人都已經看出,日本侵略中國,是“按其有預定之步驟,施其有組織之計劃,意圖鯨吞華北,進而蠶食東南。實行其大陸政策,完成其整個侵略,其心可誅,其肉可食。榆關既陷,平津危殆,民族存

亡，系於一發。凡我中華民族，應奮起而執戈或殺身以成仁，或舍生而取義，為民族爭生存，為國家保領土，此其時也。”<sup>②②</sup>法舫法師指出日本“他的野心是實現‘強寇式’的‘大亞細亞主義’，擴大‘主奴式’的‘共榮圈’，實行‘尊日式’的東亞新秩序。這就是敵寇征服亞洲真正的心肝。”<sup>②③</sup>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佛教界有識之士已經看到日本軍國主義吞并中國的狼子野心，這時再試圖用“大菩提心”、“大悲之心”去感化日本當局，無疑是白日做夢。因為“我們現在有個口號：‘漢賊不兩立’！”“‘漢’就是我們中國，‘賊’就是日本，這口號的意思，就是說中國與日本永遠萬世子孫都不能站在一齊的。因為日本在近百年來，壓逼我中國，逼害我同胞的事件太多了，我們中國人民蒙受的奇耻大辱太深了，這種仇恨，永遠不會忘失，希望同學記取這一點。”<sup>②④</sup>

法舫法師曾經專門分析過日本如何利用佛教來美化發動侵略的。他說：“敵寇亞細亞佛教學者磯部美知氏，最近在大亞細亞主義雜誌上發表了一篇論文，名曰‘新摩揭陀帝國論’。他主張現在亞洲各佛教國，應該共同聯合起來，建立一個‘新的摩揭陀帝國’，而以日本‘大亞細亞主義’為中心，日本佛教為主體。質言之，他利用佛教的名義，來誘惑東亞各佛教民族，走進日本‘共榮圈’。”<sup>②⑤</sup>摩揭陀(Magadha)是中印度之古國，為佛陀住世時十六大國之一，又作摩竭陀國、摩伽陀國、默竭陀國、墨竭提國、摩竭國、摩揭國。意譯為無害國、無惱害國、甘露處國、勝善國、不至國、聰慧國、大體國、天羅國等，位於恒河中游南岸地區，即今日比哈爾邦州南部，以巴特那(Patna，即華氏城)及伽耶為其中心。摩揭陀國為釋迦牟尼在伽耶成道，住王舍城等地說法的國家，是佛教活動中心，後來的孔雀王朝旃陀崛多(Candragupta)和阿育王等曾經將版圖擴大，摩揭陀國成為佛教徒心中的聖地。日本佛教學者利用“摩揭陀國”在佛教徒心中的地位，試圖拉攏亞洲各國佛教徒成為附庸，“這是很可注意的毒素糖衣糕餅”。<sup>②⑥</sup>“他雖裝做慈悲的姿態，那是一套假面具，他雖說出甘言蜜語，那是一種欺騙。”<sup>②⑦</sup>

中國佛教界強烈反對日本的侵略，願以身軀而起激烈反抗，以此表達“我們真正的佛教徒，全亞洲的佛教徒，實在不容忽視敵人這種陰謀，萬不可

中了他的毒計！除非我們願意做敵人的奴隸。我們要真正地聯合起來，反抗日寇這種侵略行動。”<sup>②⑧</sup>之決心，甚至以實際行動，上馬殺賊，下馬念佛。佛教徒指出：“再說佛陀的法化，雖以‘慈悲’為原則，但是對於殘害人類，斷滅眾生慧命的魔王，那是不能慈悲，是要降伏的。佛經上有句話語，就是‘對魔慈悲，即是對眾生殘忍’這就是我們佛教反侵略的根本理論，明白這一點，所以我們要抗日，要打倒日本軍閥。”<sup>②⑨</sup>中國佛教會的領導缺少這樣的認識，仍然還停留在“我們無異於一家的人”的天真想法，幻想“作這忠懇的勸告”，指望日本佛教徒能群起制止戰爭，故有人強烈批評中國佛教會，認為“我國自衛地全面抗戰發動後，全國每個角落都動員了，自動地或被動地，都走上了抗戰陣綫。或前方或後方，都奮勇地做着報導的神聖工作。各宗教、各團體，都有組織地一批批參加了抗戰救亡的工作，唯有我佛教竟無一正式有組織的單獨的救亡團體，這樣地事事落伍，那我們能不責怪唯一無二的上海中國佛教會領導無力了。過去的舊帳不算，上海中國佛教會給我們的事實，最令人不滿意的，最難以可原(諒)的，唯有抗戰其中的作爲了！‘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這是人皆知曉的大義。若非麻木不仁，利令智昏，誰都應盡他一份天職。中國佛教徒，國民一份子也，何獨不然？在抗戰初期我們真期望上海中國佛教會諸公會做一翻驚天動地的救亡事業，以贖前愆，但結果我們失望了，不但如斯，竟仍有意氣之見，黨派之究，某人某派也，從中設法阻撓，礙其救亡工作。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壓制阻撓僧青年之活動——如該會X主席拍案痛罵閩院學僧募款救災之混賬，摧殘僧教育等事之用心也！抱殘守闕，擁享憂閑，排除異己，上海中國佛教會當之無愧了，真可謂‘上海中國佛教會諸公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矣！上海中國佛教會之錯舉，莫此為甚！”<sup>③⑩</sup>

中國佛教僧人愛國熱忱高漲，披上戰袍，走上戰場，中國佛教會當然不能漠視。蘆溝橋事變爆發，國難當頭，圓瑛在上海召開中國佛教會理監事緊急會議，決議召集江、浙、滬佛教青年，組織僧侶救護隊。會上圓瑛被選為“中國佛教會災區救護團”團長，負責訓練佛教青年，在戰區擔任救護工作。其戒徒宏明

和屈映光，負責辦理上海僧侶救護隊具體事宜。消息傳出，很快有一百多名青年僧侶報名，救護隊迅速宣告成立。隊址設在上海法藏寺內。上海僧侶救護隊開赴吳淞前綫，冒着敵人的槍炮，搶救傷員。三個月中，僧侶救護兵往返於瀏行、大場、昆山之間，不分晝夜地工作着，用自己的汗水和鮮血，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寫出新的一頁，他們還負責救護租界內被日機炸傷的無辜同胞。在戰火中，有的僧人光榮獻出寶貴生命，有的被敵人炮彈炸傷，終身殘廢。中國佛教會組織的抗戰救護與慈善活動，為佛教界帶來積極與有利的影響，上海報紙將他們譽為“英勇僧侶”，外文報紙稱他們為“戰神之敵”。他們的英勇事迹，深受社會上的贊美，博得中外輿論的好評。

但是更多的佛教界人士則鮮明地發表言論，要求積極抗日。諦聞法師發大無畏獅子吼：“僧界為民族之一部，生於斯，長於斯，當此國難嚴重，民族存亡之生死關頭，不容靜坐蒲團，依然閉目參禪，應念眾生之苦，當發菩薩之願。況乎覆巢之下，決無完卵。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大家一致團結，努力抗日工作，或選強壯之僧丁，煉成勇敢之義士。或出衣鉢之餘蓄，設立治療之醫院。或赴前方，救護傷兵。或在後方，收容難民。總之各盡其心，各竭其力，同肩重任，共赴艱危。我佛有降魔之行，羅漢有殺賊之義，本此宗旨，戰彼凶焰，誰曰分外舉動，實乃應盡天職。打破帝王時代之舊習，發揮佛陀犧牲之精神，迅下沈舟之決心，誓與倭奴一周旋。圖存與存，國亡與亡，寧作戰場鬼，莫為亡國僧。彼以利器，我以熱血。彼以野心，我以義憤。十以當一，千以當百，倭奴雖蠻，其奈我何。如有慷慨，激昂而興起者，我當舍頭目髓腦以從之。”<sup>①</sup>杭州靈隱寺僧圓修等，秉乘遺教，現將軍身，行菩薩道，入伍抗敵。<sup>②</sup>南京退出時，“有不少僧侶救護隊員不忍作所謂的逃難，憑着一片愛國義憤，提槍與敵肉搏。山西五臺山上的僧侶，加入八路軍去打游擊，這類事情，舉不勝舉。”<sup>③</sup>比丘尼這時也表現非凡，如“重慶江北寺廟僧尼，近以暴敵侵犯我國，情難坐視，特聯呈縣府，願拋木魚生活，從事抗戰工作，請求予以軍事及救護訓練，裨身赴前綫，效忠回家。”<sup>④</sup>總之，“在今日即實行佛教救國是也。凡我中華民族之佛徒，激發救國之熱誠，努力救國之工作。暴日之野心一日未息，而吾人之運動一日未休。整個之河山一

日未復，而吾人之工作一日未了。總之有敵無我，矢此決心，活我國魂。強寇之炸彈臨頭，亡國之慘狀在即，中華之國土有限，暴日之野心無窮，願我數十萬之佛徒，急起而直追之。”<sup>⑤</sup>

1937年10月上海失守，國民政府已經開始西遷，要求全國性的組織都要隨政府而遷移。佛教界也認為中國佛教會應該遷往重慶，然而中國佛教會還是選擇了留在上海，沒有給全國佛教徒做出表率，引起佛教界反感，在中華民族危機大是大非面前，上海中國佛教會已經在中國佛教徒心中沒有任何地位，其領導層無疑最終被中國佛教徒給拋棄了，1940年圓瑛宣布辭去中國佛教會長，上海中國佛教會時代最終結束。

## 二 抗戰時期民國國民政府 整理佛教會的想法

1936年中國佛教會第八屆全國佛教代表大會給中國佛教帶來一線光明，但是接踵而來的日本侵略中國，使形勢發生了根本變化，中國佛教會想大展鴻圖的理想成為泡沫。1937年“盧溝橋事變”發生，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整個中國陷入兵慌馬亂，中國佛教會所在地上海已經被日本軍隊占領，根本沒有活動空間，明眼人也能看得出來，即使要恢復活動，也是在做亡國奴的情況下，成為傀儡組織。跟隨國民政府到後方的佛教界，開始聯合全國各地的佛教徒，重新成立佛教組織，開展新的佛教會活動。四川地區以重慶為中心開展“整理佛教”運動，佛教界宣稱“我們的良心主張，不但應該竭誠擁護佛教整理委員會，同時還希望能夠進一步，迅速地組成健全的中國佛教會來領導我們全國的僧眾，把時代所需要的大乘佛法發揚光大起來！”<sup>⑥</sup>

當時仍然留在上海的中國佛教會的領導層曾經幻想過要重新“開展工作”，並且在《新聞報》刊出恢復工作的消息，但是這一切都是徒勞的，因為中國佛教界根本不承認上海中國佛教會的領導權與地位。但是這一“恢復工作”的消息發出後，反而更加激怒了廣大佛教界人士，佛教界提出，“請政府速裁有效之法，一、解散該會組織。二、在國府所在地——重慶——合組一有力的中國佛教會，機構既靈

活，辦事又有所承。為國家為佛教着想，孰善於此。我們希望政府熟察焉，速善為之！民族復興抗戰救亡的工作，來日方長。佛教這一角裏力量實在不可輕視。佛教希望有一個賢明的領導機關，以新式的機構，來做衛國衛教的工作。”<sup>③⑦</sup>葦舫法師特地“謹為上海佛教會諸公一告”：“一、日本軍閥，并非真心信仰佛教，他們是想利用佛教，作侵略弱小的工具。所以日本明治維新以後佛教的興盛，是畸形的、病態的，真正的講起來，可算是佛教的耻辱。近來日閥更異想天開，偽裝僧侶，在暹羅、緬甸、南洋一帶，作間諜工作，這種破壞佛教的行爲，簡直是魔鬼不如，哪裏够得上說信仰佛教！二、所謂東亞佛教會、日華佛教會者，去年竟公然發布通訊，遍寄中國佛教機關，為其軍閥獸行辯護，如云：‘日本行動是自衛，非侵略，無領土野心。’‘此次事件，日本是為維持東亞和平。’又云：‘中國國民政府，先容納唯物主義的共產黨，繼之結親歐美三者排日抗日，絕滅善鄰。’這種幫凶的話，只有日本佛教徒講得出，因為日本佛教徒的靈魂，已被他們的軍閥魔鬼吸去了。所以才不惜出賣人格，出賣佛教啊。三、上海中國佛教會辦事人，不乏修持有素之比丘，素具名望之居士，於佛教救護事業，顯著成績！或因生計環境，一時不能離滬，此類人士，決不為日人利用，固所深知，甚願迅即通訊脫離，設法離申，一致為改組之運動，增加抗戰力量。四、上海早成孤島，……現在日寇正在九江沙河一帶，展開大戰，企圖以全力奪取武漢，這是抗戰第二年的開始，同時也是我們中華民族遭遇外寇逼迫的難日。上海中佛會辦事人，應立即宣布停止活動，回到後方一致為改組運動，領導全國僧尼救亡圖存。否則，苟活在租界裏，這有什麼意義呢？”<sup>③⑧</sup>

中央政府早就注意到佛教界的情況，內政部禮俗司司長陳念中說：“抗戰軍興以還，全國各團體各派別，無論以往意見如何紛歧，鬥爭如何激烈，咸釋嫌言，好共濟艱危。佛教團體原奉釋氏教義，向以無私無我，慈悲救世為懷，於茲生死存亡關頭，豈可更無進一步之團結精神，以表現於世？我人固馨香禱祝，深願全國佛教徒，及時振奮，而有以自拔也。”<sup>③⑨</sup>1940年，中央政府召見蔣作賓與李子寬兩位居士，詢問健全組織佛教的方案。中央社會部提出整理中國佛教會意見書，徵求政府及佛教界之意見。<sup>④⑩</sup>蔣作賓認為：“現在

中央政府，對於佛教是非常注意的，因為有些意志不堅定的僧伽，受敵人利用，做賣國的勾當，作起漢奸來，因而良善的僧侶，都受他累，這真是僧界中的一大耻辱！而今國家很想把僧侶有系統有紀律的組織起來，統一起來。中央政府的領導者，最近曾為佛教這一角落的事，詢問李子寬先生及我，有什麼辦法，能把佛教的出家徒眾團結起來，統一起來？我對佛教沒有什麼認識，當然沒有什麼意見奉獻。李先生與佛教接近得多，對佛教的認識也很清楚，而對佛教的愛護也很熱忱，他說現在主管機關已有計劃，什麼地方應該改革，什麼地方應該建樹，都有縝密的籌謀，這樣做去，將來佛教絕對會得復興的。”<sup>④①</sup>

李子寬是民國著名居士，太虛大師的堅定追隨者，他撰文說：“中國抗戰已逾三年，於建國大業，同時並進，各項政務效力加增，社會部、內政部，以宗教關係國民精神文化生活者至大且深，現在流行國內之宗教，以佛教最為普遍與深入民間，而領導國民文化精神方面，佛教所居地位最為重要。又蒙藏各地佛徒極眾，領導邊區人民使之內向，佛教所系尤重。又在抗戰時，全國僧尼，約七八十萬眾，盡能擇青年之體格健全者，擔任戰時救護及生產慈善等事業，有益抗戰建國，當為不少。因趁此時機，以人民團體整理辦法，規定整理之條件，加以整理中佛會，選定大德高僧，組織整理委員會，代行理事會職權，改組并健全各地分會之組織，依法召集全國代表大會，改選理監事，由兩部各派一員指導辦理，并由整理委員會，聘請在家居士任設計委員，以收配合維護之效。此事已徵求各方意見，不久當見之實行，是中央現在希望有健全的佛教團體，來助抗建事業者三也。”<sup>④②</sup>蔣作賓與李子寬二人透露中央對佛教的關注，特別是在抗戰時期，佛教所能發揮的作用，已經得到中央政府的充分肯定，上海中國佛教會可能對中國佛教的傷害情況，已被中央政府掌握，所以中央政府確實有意要對佛教進行一番整頓，以此來提高佛教界的抗日能量。

國民政府管理宗教的領導撰文談到今後復興佛教的必經之途徑。內政部禮俗司長陳念中強調復興佛教的原則是“民衆不能離宗教而得圓滿生活，佛教不能離民衆而發揚光大”<sup>④③</sup>。陳念中進一步解釋說：“蓋民衆無宗教，無以求得圓滿之精神生活，而佛教



離開民衆，亦斷無足以發揚光大之理。況當此抗戰建國時期，佛教所負之責任，究未甘後人，……今日凡人一切物質上之需要，科學皆優爲之，惟人類苦難死亡與夫心靈上之安慰，則非宗教不足以解決而供應之，民衆不能無精神生活，斯不能離宗教而獨立，安心靈，出苦海，宗教之功甚偉，而宗教之應普遍的傳播，則東西各國，如出一轍。”陳念中指出了中國人缺少宗教信仰，沒有精神生活，因此佛教不能光大。他舉例東西方國家日本的神道教與歐美的基督教對人民生活的影響說：“日寇侵華，其兵尸體均有護身符之發現，足見日本宗教傳播之廣，且能應用於軍事方面，以鎮攝戰士之心靈。歐美耶教，窮鄉僻壤，皆有教堂建置，來復之日，不論貧富，莫不群集禮拜，不啻六日工作，必有一日作精神上之修養，是宗教傳播之廣，寢假而入於一般人民之生活中。”宗教已經浸入了人民的生活之中，成爲日本與歐美各國人民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深入底層，控制人民的心靈，但是“返觀我國民衆生活，物質既已缺乏，無日不拘鎮於困頓流離貧苦患亂之途，而其所以需精神上之慰藉，反一無所有，試觀今者廣大群眾所得宗教上之慰藉者，果爲何如？愚者趨於迷信佛事之一途，智者沉於哲學玄虛之玩弄，習非成是，積重難返，可爲浩嘆！”所以佛教在中國，既不能深入民間，遠違佛旨，又沒有可以讓人讀懂的經典，佛教教義不能普及，缺少了“如家喻戶曉之宗教宣傳工作及其事業，尚不能推進，又何以深入？”

陳念中是以日本與歐美國家的宗教影響作爲參照系來比較中國佛教的情況，日本的神道教、歐美的基督教都在歷史上不同程度的作爲國教形象而出現，神道教作爲國教，在行政和教育上與國家密切結合，進行敬神愛國、崇祖忠皇教育，每個日本人生下來後就與神社有着密切的關係。基督教則在中世紀時一直是西方國家的國教，凡是西方人一生下來就要到教堂受洗，而這些情況在中國是沒有的，因爲中國從來沒有國教，中國人的宗教信仰是彌散性的，沒有嚴格地規定與必須要遵守的宗教禁忌，也不去過定時的宗教生活，這種看似自由的宗教觀，在一些學者的眼裏被認爲中國人是無神論者，如果有宗教信仰，也是“臨時抱佛腳”的心態，有事求神，無事不求。

只要有人類，必有宗教信仰，中國不是沒有宗教，也不是宗教不普及，傳統的中國宗教最有影響的不是佛教與道教，而是被民國政府稱之爲“淫祠”的民間宗教或民間信仰。這種宗教信仰以多神和泛神的形式而流行於廣大民間，支配了中國人的日常精神生活。民國政府管理宗教部門受到西方宗教觀影響，沒有看到民間信仰在中國人民生活中的影響與重要性，總是試圖將那些在中國人精神生活中最有影響的民間信仰驅逐出宗教領域，妄想采用行政的辦法消滅這些民間宗教。作爲國家宗教管理部門，看重的是成型化或體制化的宗教，對具有彌散性的民間信仰采取了嚴厲取締政策。佛教進入明清以後，由於宗教市場需求，被迫越來越與民間信仰發生互動，佛教的理論與思想沒有得到提升，民間化却有了很大發展，清末民初“家家觀世音，戶戶阿彌陀”已經成爲中國佛教在民間影響最有說服力的例子，特別是觀音菩薩信仰已經與佛信仰并列，成爲中國佛教影響最大的信仰之一。陳念中對民國佛教的判教是誤判，也正是這種誤判，影響了民國佛教發展，主觀地想用行政與人爲的辦法，將中國佛教升級到與日本、歐美宗教的情況，結果適得其反，政府對佛教的整理沒有取得成功，反而以失敗告終。

陳念中誤判中國佛教，得出中國佛教“其所以不能作宗教上普遍深入之工作者，無他，即宗教徒之退化，與其組織及工作方法上之不能完密周備是也。蓋此種現象之發生，原因有二：一曰一般僧尼對於教育程度之缺乏，不能明了其工作之意義與方法，并不能勝任其必要工作之推進，故陷於迷信佛事之末端，而不能自返也。二曰一般民衆對於佛教認識之不足，目前僅有高深繁博之經典，尚無淺顯完備之普及善本，故高僧雖世世有之，而玄博之經典，適僅爲士大夫所據以眩誇而自尊之具，習統相傳，所從來久矣。……蓋歷來言佛者，莫不以出世爲尚：一若棄絕塵緣，即可成佛，而竟忘却尚有普渡衆生之工作，爲其必經之路也。以故研求經典者，僅屬少數學者求知好奇之事，企悟佛理以超脫一身，至是否與世共賞共悟以共求超脫，則非所問也。其遁入禪門者，僅以作佛事誦經典而止，即與民衆發生關係，亦不過與疾病死亡有關之迷信諸事，至於普渡衆生之積極實際工作，則又非所習聞也。此種消



極無爲并與世隔絕之傳統習慣，其結果，則置廣大民衆之精神生活於不顧，棄大慈大悲救苦救難之慈善公益事業而不爲，宗教與民衆生活，隔成兩截，佛教乃變爲消極無益之教，而教徒變爲閑游無益之民矣。且僧衆平日受人民之供奉甚厚，今於人民精神生活，乃一無貢獻，捫心自問，何以自安？如此而言佛教之發揚光大，豈不緣木而求魚耶。”陳念中所指出的佛教不足，缺少教育，缺少人才，理論不出，經典不普及，迷信程度高，注重出世等等都是存在的事實，也是中國佛教界在民國以來一直致力於改變的情況。但是長期以來，中國社會儒釋道三家分工是非常明顯，儒家治國，道教養生，佛教治心決定了三教各自發展的方向。佛教作爲治心的宗教，必然要走出世的道路，從解脫上給當下的人們提供一個世外桃源，如果缺少這一點，佛教則不可能在社會上立足，所以民間一直有“空門”之說，將寺院與世俗社會分別開來。但是佛教在走出世的道路之時，同樣也非常重視入世，中國大乘佛教一直強調“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菩薩精神，慈能拔苦，悲能予樂的菩薩精神則一直是中國佛教普渡衆生的基本原則，以及慈善公益理論的基石，廣修供養，懺悔業障，常隨佛學，恒順衆生的菩薩願力激勵中國佛教徒“不爲自己求安樂，但願衆生得離苦”，總之，中國佛教從來沒有脫離衆生，并且一直在踐行弘法利生的偉大使命。中國佛教之所以在明清以後看似漸漸遠離社會，其根本原因還是由宗教市場需求而決定的，整個社會將佛教定位在延壽超生的位置，刺激了佛教驅鬼超度的功能發展，而佛教治心傳統則日益萎縮，不得不按照民間信仰的市場需求而去滿足信衆的需要，只好放大佛事功能。此外，佛教人才不出，理論不進也與佛教衰落，法門秋晚有重要關係，但是如果我們考慮到民國時期，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洗禮，傳統文化已經受到致命打擊，從此一蹶不振，而西方文化思想和科學技術已經成爲中國社會主流思潮，傳統的佛教被視爲“迷信”，在這個判斷標準下，加上社會上掀起的廟產興學，對佛教無疑是雪上加霜，參與社會的能力減弱，能够自保已經不錯了。陳念中看到了中國佛教的不足，但是却忽視了整個中國文化大背景的衰落，以及外來文化對中國的影響，故他得出的結論“所謂：不入

地獄，不能普渡，此種積極精神之消失，殆爲今日吾國佛教衰亡之原因歟？”這僅是從表象上去評判中國佛教，不是從更深層次的文化背景與外來文化的影響，來正確說明中國佛教的情況。他的判斷影響了政府對中國佛教的看法，讓政府覺得中國佛教是消極或是沒有出路的宗教，日本或歐美基督教“但其重視實行教義，則可於其傳教與所辦之公益慈善事業證之，較之吾國今日，禪林叢立，遺世孤存，而不與民衆發生密切關係者，誠有天壤之別矣。”

面對中國衰落的佛教，陳念中給復興佛教開出的綱領是“培人才，纂經典，理僧伽，施訓練，興事業，去私見。”他說：“綜上觀之，可知今後佛教之復興，其最基本之原則，與必循之途徑，自須使宗教與民衆生活發生密切之關係而後可，一切革新之政策與事業，亦須懸此鵠的，以求策進，具體言之，約得數端：一、佛教教育更須擴大與推進，縱的方面，須有高深的佛教教育，以儲備專才，造就名僧，使足以闡揚教理，領導僧衆；橫的方面，須實施普遍的僧衆補充教育，使其明了所負之任務，并足以擔負宣揚教義之責任。二、佛教經典宜加纂輯，使有通行完備的善本，足以傳誦於民衆。三、僧伽制度。宜加整飭，使教內分子整齊，基礎鞏固。四、訓練并選派傳教人才與管理人才，使內足以健全佛教之組織與事業，外足以努力於宗教之宣傳工作，普及於民衆。五、普渡衆生，必須見之於事實，於誦宣教之外，尤須舉辦救苦救難之慈善公益事業，如醫藥、濟貧，教育等，較大寺廟，每處尤須辦理一二事。六、佛教組織不分派別，應即皈依佛言，共同合作，以興教爲惟一目的，其再以排他而起之糾紛，即爲佛教之叛徒，應受教規及法律之制裁。今後復興佛教，應即腳踏實地，具有積極救世之精神，斷不能離開民衆，再陷於以往消極絕世之玄想，更不應再起糾紛，攻訐互哄，庶佛教之光大可期，而中華民族之復興，亦與有賴焉。”

陳念中開出的復興佛教的綱領，是切中佛教不足之處的藥方。但是從佛教界表現來看，這個復興綱領仍然還是表面的，只是就事論事，沒有深入到佛教骨髓，看不到根本問題所在。“在佛教界內所爭論的佛教問題，其實還沒有真正關涉到佛教的本身，不過是僧徒的吃飯問題而已，長老們要維持他們傳統的地位，不得不頑固地和環境爭鬥，而那班

還沒有掌握到寺廟財權的僧徒，流蕩在全國各地，各顯身手以謀食謀衣，常常會發生尖銳的競爭，再加上一班吃教的人掀波作浪，所謂佛教問題乃日形複雜而沒有辦法可以解決。”<sup>④</sup>佛教問題的解決，重要的還是要在制度上變革，將舊有不合時代的制度淘汰或整理，創立新時代要求的制度，這才是保證佛教與社會相適應，全面走向社會的根本保障。故太虛指出：“由斯可見佛教僧寺無負於國家社會，而各界豪強人物，則每因僧寺頹散愚弱可欺，征用屋宇田地也，派捐債款糧食也，必先較以人民數倍之重量加其上，創行一新政制也，擴設一新學校也，則占寺奪產，毀像逐僧，更認為當然舉動。豪強者坐享富貴權利榮譽，而反逃避義務負擔；民衆中如寺僧者，雖已犧牲加倍，仍受盡詆辱蹂躪而伸訴無地，則國家社會有負於佛教寺僧者實多也！宗教平等，信仰自由，其固非愚且弱者能同享乎？則佛教寺僧應知今後決非可以愚弱自安，若安愚弱則唯有滅亡耳。而在有抑強扶弱俠義精神之政治當局，亦垂念此愚弱者固為忠良國民，如何扶植之，俾有以自立乎？”<sup>⑤</sup>所以佛教要復興，首先要自強，不能自強，則無出路，自強是要爭取來的，而不是靠別人施舍來的，政府要給佛教界創造自強的環境，整個社會要給佛教自強的信心，佛教界內部要依靠體制的改革與創新的自強勇氣，才能真正走上自強的道路，佛教才能在整個社會得以復興。

國民政府對佛教及其在抗戰的作用，認識始終是清醒的，只是對一些具體的情況不太了解而已。1940年6月4日，國民黨中央社會部部長谷正綱給蔣介石的報告中就指出，“中國佛教會自抗戰軍興，即滯留上海一隅，會務逐漸停頓。以致各地佛教會一切工作，無從推進，故對於該會組織之健全調整，已屬必要。惟以茲事體大，該會過去人世復多糾紛，辦理自應慎重。素仰我公對於佛教會事務，多蒙關垂，用特檢奉本部整理中國佛教會意見送陳察閱，并祈賜誨指示，毋任盼禱。……”<sup>⑥</sup>國民政府關心中國佛教會，這是看到中國佛教會能對抗戰起到作用，強調要進行重新整頓，健全其組織的必要性。國民政府認為：“宗教關係國民精神文化生活者至大且深，我國原有之宗教，厥惟道教，然其勢早衰，現在流行國內宗教，以佛教最為普遍深入，……”<sup>⑦</sup>而對當前

佛教問題，國民政府則認為：

甲、佛教與文化。我國佛教雖亦由國外傳入，然流行已歷二千年，信眾之多，對於國民精神生活影響之大，罕有其匹。尤以晚近各種西洋教會在中國內傳播極速，其教義之內容如何，姑不具論，然與列強政治經濟之侵略接踵而至，各該教會與其本國關係又復息息相通，顧此種種，自不能不有所怵惕。目前格於情勢，對外來文化侵略，一時不能在政治上採取積極防止辦法，因此不能不於領導國民文化精神方面多用工夫，以便集中國民意志，建立精神國防，為達到此目的，佛教所居地位，坐是轉形之重要。

乙、佛教與邊疆。我國國內藏族全部為佛教，出家喇嘛與在家信徒固無論矣，即滿蒙康青寧各地佛教亦極盛行。此外，緬甸、安南、暹羅、日本都盛行佛教。如須確切深入領導邊區各地民衆，吸引邊民內向，固不能不藉佛教以資聯系，即為防止強鄰假藉佛教關係以為侵略之工具，勢亦唯有加強對於佛教組織之領導，發揚佛教積極救世之精神，期對各佛教國家民族發生領導作用。

丙、佛教組織與戰時動員。我國信佛之人，除在家男女居士不計外，出家之僧伽人數若干，尚缺詳確統計。據中國佛教會以前調查，全國共有大小寺廟庵院二十六萬七千餘所，僧尼七十三萬八千餘人（四川、河南、江西、安徽、湖南五省尚未列入）。證以湖北省政府統計室公布之全省僧尼統計數目，計和尚三萬零三百九十二人，尼姑一萬二千一百二十八人，統共僧尼四萬二千五百二十八人。可見此推測全國（舊本部各省）僧尼數目在八十萬至百萬之間。僧尼一切生活不出寺廟範圍者占絕對多數，彼等生活恒超然於一般國民政治社會生活範圍之外，唯賴有佛教會之組織，以適合其特殊需要，由此佛教會實關係國內八十萬以上僧尼之組織問題。至基於戰時動員之原則，如何使適齡僧人服兵役，如何動員僧尼擔任戰時救護救濟，均賴藉佛教會組織加以

推進。<sup>④⑧</sup>

佛教是中國宗教最有勢力的，這毫無疑問。國民政府指出當前佛教的三大特點，即一，傳統中國佛教平時可以抵禦外來的文化侵略，戰時可以“集中國民意志，建立精神國防”。二、佛教可以內“吸引邊民內向”，外“防止強鄰假藉佛教關係以爲侵略之工具”。三、佛教僧尼近百萬人，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唯有佛教會可以將他們統領起來，在戰時發揮作用。上述三個特點，不僅適用於抗日戰爭特殊時期，也適用於平常時期，可以爲政府所利用的一支重要力量，佛教對國家、民族發展與安全，顯示了重要作用。“南京失陷之後，上海與內地消息隔斷。日本佛教盛行，平日利用佛教關係潛派日僧前往我國各地寺廟活動事，已屢見不鮮，抗戰以後敵人此項活動之加緊進行，自屬意料中事，如組織日華佛教研究會、東亞佛教會、近更分途策動組織各地原有之佛教會，種種活動，不一而足。”<sup>④⑨</sup>在抗戰特殊時代，有佛教會組織佛教界積極參與反對日本侵略的鬥爭則顯得更加重要，這在谷正綱給蔣介石信中專門用了“茲事體大”四字做了特殊強調，而政府亦明確看到，對中國佛教會，“舍采用整理辦法，即無法建立其組織，亦唯整理，始克健全該會組織也。”<sup>⑤⑩</sup>佛教界則更是強調：“當今而言振興佛教，非有佛教整理委員會不可，擁護人家就是擁護自己，決沒有虧吃。團結起來，僧青年和長老們，擁護佛教整理委員會！”<sup>⑤⑪</sup>

本來政府還對圓瑛等人抱有幻想，以爲“該會自二十六年十月具呈前中央民衆訓練部最後核定修正各項組織章程之後，不久南京失陷，與中央關

係即經中斷。該會在上海公共租界設有總辦事處，理事長圓瑛及常務理事多人均在滬，故南京失陷後，該會仍得繼續辦理江浙一帶會務。其後圓瑛出國，秘書長常惺物故，僅常務理事大悲一人來往鄞滬，會務情況沉寂無聞。本部迭請滬市黨部、中央調統局代爲調查，均未獲有結果。去年底，圓瑛在滬被敵綁架赴寧，旋又釋放，一時風傳，遂有圓瑛已接受敵方條件，出面組織僞佛教會，以供敵人利用者，內情如何，雖一時無法加以證實，然蛛絲馬迹，似有可尋，爲圓瑛表示態度計，自宜早日來渝，始可爲事實上之剖白也。”<sup>⑤⑫</sup>但是可悲的是，“不料自二十八年一月去電之後，迄今杳無消息。”<sup>⑤⑬</sup>圓瑛沒有接受中央政府請他到重慶的邀請，又被日本“綁架”去了南京，中央政府對他有所懷疑，民國政府“旋首都西遷，該會原設總辦事處於上海，實際上爲該會會務中心所在，南京所設會址，不過虛有其名。自南京失陷以後，該會與中央關係即完全中斷。”<sup>⑤⑭</sup>政府最後只能承認，“在滬之中國佛教會，形同解體，圓瑛被敵拘捕，旋予釋放，今後惟期彼不致投附敵僞，整理之時自應妥爲延致。如彼不來重慶，勢不能任彼公開領導會務，故情況演變至今日，上海佛教會對於本案之重要性，已不復存在。”<sup>⑤⑮</sup>只要圓瑛不與日本人合作，整理佛教的事情是可以往後放一放的，但是上海中國佛教會遠離重慶，圓瑛也不來渝，政府最後只好放棄幻想，啓用太虛來重建中國佛教會的工作。

【黃夏年 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所研究員】

## 注 釋

- ① 雨岩《佛教報恩與抗戰》華南覺音第二期。
- ② 《海潮音》第九卷五期。
- ③ 《佛學思想之發展及其今日之新趨勢》，《佛教評論》1931年第一卷第一至二號，梁建樓編輯《法舫文集》第四卷，金城出版社，2010年版。
- ④ 法舫譯《支那佛教視察所感》，載《海潮音》第十年第三期，梁建樓編輯《法舫文集》第一卷，金城出版社，2010年版。
- ⑤ 太虛《建僧大綱》，民國十九年春在閩南佛學院講。
- ⑥ 法舫《走上世界佛學之路》，載《海潮音》第十八卷第四號，《法舫文集》第五卷。
- ⑦ 太虛《為沈陽事件告臺灣朝鮮日本四千萬佛教民衆書》，《海潮音》第十二卷第十一期。
- ⑧ 《法舫文集》第五集《評第二屆太平洋佛教青年會》第13-14頁。
- ⑨ 太虛《中國危機之救濟》，《太虛大師全書》精第24冊，p.34～p.35。
- ⑩ 太虛《因遼瀋事件為中日策安危——二十一年三月作——》，《太虛大師全書》精第24冊，p.46～p.53。
- ⑪ 太虛《抗戰四年來之佛教——三十年七月作——》，《太虛大師全書》精第24冊，p.230～p.239。
- ⑫ 《法舫文集》第五集，第58頁。
- ⑬ 雨岩《佛教報恩與抗戰》《華南覺音》第二期。
- ⑭ 《海潮音》十八卷八期，《太虛大師全書》精第26冊，p.298～p.299。
- ⑮⑯ 法舫《我們對於日本佛教的態度》《法舫文集》第五集，第31-33頁。
- ⑰ 《建立護國法會之目的及其理由》，1932年《四川佛教月刊》第十二期“護國法會專號”，10頁。
- ⑱ 法舫《為日本侵華事告全世界佛教同志》，《法舫文集》第五集，第36-37頁。
- ⑲⑳ 1932年《四川佛教月刊》第十二期“護國法會專號”，10頁；11頁。
- ㉑ 《四川佛教月刊》第八年第一期。
- ㉒ 諦聞《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僧界書》，《諦聞影塵集》1939年，寧波。
- ㉓㉔㉕㉖㉗ 《海潮音》第二十二卷第五號，轉載二月廿二日仰光《中國新報》。
- ㉘㉙ 樂觀《衛國與護教——在滇邊特區佛聯會佛教學校開學典禮席上講》，載《奮迅集》第五二頁。上海護國禪院1947年元月版。
- ㉚ 會員《上海中國佛教會》，《華南覺音》第三期。
- ㉛㉜ 諦聞《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僧界書》，《諦聞影塵集》。
- ㉝ 《佛海燈》月刊第二卷十一二期合刊。
- ㉞ 今值《談僧侶抗戰》，《華南覺音》一九三八年第九期。
- ㉟ 香港四月十七日《立報》。
- ㊱ 廣文，《我們對於佛教整理委員會》，《四川佛教月刊》1941年11月第十二年第九、十、十一期合刊。
- ㊲ 會員，《上海中國佛教會》，《華南覺音》1938年11月總第三期。

- ③⑧ 葦舫,《告上海孤島中國佛教會書》,《海潮音》1938年8月第十九卷第八號。
- ③⑨ 陳念中,《今後復興佛教必經之途徑》,《海潮音》1938年6月第十九卷第六號。
- ④⑩ 參見《印順法師佛學著作集》第6卷《太虛大師年譜》(中華書局2009)第312頁。
- ④⑪ 蔣作賓講、演培記,《復興中國佛教建立國際的現代佛教——蔣作賓先生在漢藏教理院講》,《海潮音》1940年9月第二十一卷第九期。
- ④⑫ 李子寬,《從國民革命的黨政軍上來觀察佛教》,《海潮音》1940年9月第二十一卷第九期。
- ④⑬ 陳念中,《今後復興佛教必經之途徑》,《海潮音》1938年6月第十九卷第六號。以下陳念中文皆引自此。
- ④⑭ 古徽,《所期望於佛教整理委員會者》,《獅子吼月刊》1941年3月第一卷第三、四期合刊。
- ④⑮ 太虛,《抗戰四年來之佛教》,《太虛大師全書》27卷,宗教文化出版社,417-418頁。
- ④⑯④⑰④⑱⑤⑰⑤②⑤③⑤④⑤⑤ 《國民黨中央社會部關於整理中國佛教會意見致蔣介石函件及國民政府文官處復函》,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二編文化(二),江蘇古籍出版社,775頁;779頁;779至780頁;778頁;782頁;777頁;778頁;776頁;782頁。
- ⑤① 古徽,《擁護佛教整理委員會》,《獅子吼月刊》1941年9月15日第一卷第八九十期合刊。